

金秋寄语



2014年第5期 总第95期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离退休工作办公室



2014年7月23日，全国友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市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举办了“向友谊致敬—二战中美合作图片展”。李小林会长、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刘健、美国大洛杉矶郡郡长安东尼诺维齐、美国尼克松总统图书馆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巴瑞鲍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外孙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以及洛杉矶地区各界友好人士近百人出席了开幕式。此次展出的历史图片都是由二战期间在华美军照相连士兵所拍摄，生动记录了7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反映了二战期间中美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并肩作战的美好情谊。



主 办：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离退休工作办公室

编 委：孙振亚 王金城 王敬华 郭庆岚 郭自勤 张淑君

责任编辑：孙振亚

版面设计：张淑君

投稿邮箱：youxielituiban@163.com

联系电话：65272829

目 录

《金秋寄语》

2014 年第 5 期 总第 95 期

9 月 26 日出版

-
- 简 讯 编者辑 4
 - 征 文
 - 亲历邓小平 1979 年访美时两场历史性活动 卞庆祖 1
 - 1947 年在西柏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回忆 梁 畊 5
 - 也谈足球 刘庚寅 6
 - 王炳南与路易·艾黎的晚年
—— 纪念全国友协成立 60 周年 吕宛如 7
 - 怀念韩叙会长 苗在芳 12
 - 太平洋不太平 (诗) 孟宪如 14
 - 忆郭东俊 顾子欣 15
 - 中秋 (诗) 郭自勤 17
 - 请继续父辈们的梦想 郭自勤推荐 18
 - 讣 告
 - 哀悼里若同志 编者辑 19
 - 封 面 秋色照片 编者辑
 - 封 二
 - 李小林会长参加“向友谊致敬—二战中美合作图片展”开幕式照片
..... 编者辑
 - 封 三 友协秋色照片集锦 编者辑
 - 封 底 书法作品 王金城

亲历邓小平 1979 年访美时 两场历史性活动

卞庆祖

今年 7 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为拍摄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同志 1979 年访问美国的《旋风九天》，从外交部查找当时驻美使馆参加接待邓访的人员，得知我是其中之一，即要求进行采访。在决定接受采访后，我马上查阅有关书报和资料，认真思索回忆和准备。

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2 年访华后，1973 年 5 月，中国在美国华盛顿市建立了驻美联络处。1979 年 1 月 1 日，中国和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79 年 3 月 1 日，中国驻美联络处改为驻美使馆。中美建交不久，小平同志就应邀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国家领导人正式访问美国，具有非凡历史意义。

我 1977 年至 1981 年曾前后在驻美联络处和驻美使馆任二秘。在小平同志 1979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5 日访美的华盛顿期间，领导决定我作为新闻联络官，参与接待工作。由于联络工作的性质，我身挂美方颁发的安全级别较高的证件，可以在一些重要场合，自由活动。其中的两场活动，白宫正式欢迎仪式和美国三大电视台联合采访，我在只几米之遥的所见所闻，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1979 年 1 月 29 日，是全世界瞩目的一天。那天，虽然美国华盛顿市正值严冬腊月，寒气逼人，但是天空晴朗，光照能见度好。上午十点，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玫瑰花园南草坪，正式欢迎小平同志来访美国。现场的美国各界观礼嘉宾、中国访美代表团和我使馆人员，加上 300 名中美和其它国家的记者，共千余人，可谓热闹非凡，盛况空前。卡特总统及夫人在七八米长的红地毯上，从小平同志夫妇下车后，一直陪同走到演讲台。此时美军军乐队奏中美两国国



1979 年 1 月 31 日，驻美使馆为邓小平到访美国举行招待会时讲话照片。

歌。随后卡特总统同小平同志一起检阅美国三军仪仗队，同时美军鸣放 19 响礼炮。美国政府以国家元首的外交礼仪接待小平同志访美，是完全超出常规的。邓小平同志访美的名义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美国给予超规格礼遇，实际相当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待。美国接待它国国家元首，一般鸣放 21 响礼炮。如硬要说什么差别，只是鸣放礼炮少了 2 响，其它则别无二致。这些充分表明卡特政府对小平同志访问美国的极高度的重视。

小平同志下榻的美国布莱尔国宾馆与白宫只隔一条马路，近在咫尺。十点稍过，小平



1979年1月31日，驻美使馆为邓小平到访美国举行招待会时入场照片。

同志乘坐的黑色高档贵宾车，慢慢开进白宫南面外交大门时，卡特总统夫妇已满面笑容地在红色地毯的一头静候。黑色高档贵宾车刚停，美国礼仪兵即上前拉开车门，小平同志还未完全下车，卡特总统已亟不可待地跨步上前，与小平同志热情握手，此时翻译冀朝铸才匆匆忙忙赶过来，为中美两国领导人翻译。我一名年轻的外交官，万分有幸，能站在离小平同志下车的车门两三米之处，近距离地目睹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真是激动万分，难以忘怀。2012年12月，一次在京举行的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研讨会上，卡特总统作主旨演讲。会间，我发言时向卡特总统讲述了我这段亲身经历。研讨会会后见面时，卡特总统说非常高兴见到我，但感到有些意外，想不到在场几十位中美学者专家中竟会有人见证35年前的这一历史场景。他还与我合影留念。其实，在近距离亲眼

看到卡特总统与小平同志亲切握手的中方人员，的确是极少的。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访中国。周恩来总理在机场同尼克松握手时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有些人称之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1979年1月29日，卡特总统同邓小平副总理在白宫的热情握手，是开创中美关系新时代的握手，也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的握手。它的历史意义怎么评说都不会过。在接受美国三大电视台联合采访时，小平同志表示，中美建交不仅是两国关系的“蜜月”，而且这个“蜜月”还会继续下去。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充满信心。在中美建交后的35年里，两国关系得到了飞速发展，是当时关心和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怎么想都想像不到的。中美建交时，两国贸易仅有24.5亿美元，现已达5200亿美元（美方统计是5600亿美元），增加了200多倍。除经贸外，两国科技、教育、人文、军事以及民间交流等方面的合作蓬勃发展。中

美两国人员的互访交流更是增速惊人，仅中国去美国的各类人员，每年就有 400 万人次之多，也就是说每天有一万多国人乘飞机去美国。中美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的数量从零发展到 200 多对。当然，中美关系发展不时会有艰难险阻，矛盾困难甚至冲突，但它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型曲折发展，总的趋势是向前的。邓小平访美 35 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证明，保持良好的中美关系既有利两国共同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应对中美关系的持续发展保持信心。

邓小平同志在华盛顿市接受美国三大电视台采访，通过电视直接向美国广大民众传递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信息。这是小平同志访美的又一重头戏。

在布莱尔国宾馆内一间约三四十平米见方的房间，小平同志座椅背对壁炉，其前左右两侧分别放有两座小沙发。这四座小沙发是四位采访人坐的。在美国，这种壁炉前的谈话称之为“炉边谈话”。“炉边谈话”起源于 19 世纪 30 年代，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为解决全国面临的严重困难，以坐在壁炉前亲切交谈的方式，直接向美国人民喊话。此后，先收音机广播后电视直播的“炉边谈话”成为普遍欢迎的国家领导人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方法，受到广泛好评。这次参加采访小平同志的有美国三大电视台，即美国广播公司（ABC），国家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后来又有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PBS）加入。在采访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中，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王牌主持人克朗凯特最有人气。当时克朗凯特的名字在美国“家喻户晓”，是“全美国最值得信任的人”，号称比美国总统还受欢迎。从采访人的名声，也可以看出这场活动的影响。现场我就站立在小平同志座椅左侧沙发的后面，经历了采访活动的全过程。

1979 年 1 月 31 日下午 3 点，在布莱尔国宾馆内，美国三大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对小平同志进行了联合采访的“炉边谈话”。美国三大电视台联合采访，是即问即答，问题没有多少限制的“言论战”。三大电视台联合采访在美国就极少见，后加上公共广播电台共四大电视台联合采访，又说要电视实况转播，显得这场活动的分量更重了。双方商定：小平同志的答话必须全部播出，不能掐头去尾；翻译必须要整段翻。以免一句半句的，易丧失原意。在不大的这间房间里，人员众多又有聚光灯的强烈照射，室内温度很快升高，小平同志看来相当兴奋，脸上红通通的。根据安排，小平同志首先向美国人民发表了简短讲话，向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虽说这种即问即答，难度很大的采访活动，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来说，既陌生又新鲜，后来有人称这场活动是“破天荒”、“史无前例”。但是，在 30 分钟的精彩答问中，小平同志始终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以新中国领导人的满满自信，坦率果断，对答如流。谈话内容主要涉及中国改革开放，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在谈到改革开放的问题时，他说，“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中国不单是中央的领导，而且地方的领导，

全国人民在这方面是一致的。”改革开放，“肯定会继续下去”。因为它“对人民有好处，是人民拥护的”。这场美国电视台联合采访的活动，赢得了广大美国观众的称赞和欢迎，极大提高了中国领导人的国际形象，小平同志成为美国《时代》周刊 1979 年首期的封面人物。

小平同志以铿锵有力的语言，向美国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以及国际社会，说出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在美国和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和持久的影响。我之所以认为小平同志与卡特总统握手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同世界的握手”，是因为小平同志访美恰逢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元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向全世界而主要是对西方世界的开放，美国则是西方世界领头羊。大量事实表明，正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中国在不长的时间里便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力地推动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迅速崛起。中国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世界第 15 位，到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得到极大提升。这一切都远远超出国人和世人的预料。它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的高瞻远瞩，也显示出邓小平 1979 年访问美国的伟大历史意义。

(此篇文章中的照片由卞庆祖同志提供)



简 讯

※ 2014 年 8 月 28 日上午，老干部党支部在离退办阅览室召开老干部支部支委会，听取离退办对下一阶段工作情况的汇报。

孙振亚主任将离退办下半年的主要工作介绍如下：9 月 23 日—26 日组织离休同志进行休养；元旦、春节两节走访；继续配合国管局发起的为失能半失能老同志康复训练计划实施；老年大学于 9 月 1 日正式开学，书法、太极、合唱等班陆续开课；10 月份组织老同志秋游和党员政治学习；春节前组织老同志团拜；12 月初将召开《金秋寄语》座谈会等工作。

离退办与老干部支委们就下半年工作及活动计划进行了交流，并达成一致意见。

※ 《金秋寄语》刊物是我会离退休同志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平台，深受离退休同志欢迎。为了方便大家及时阅读，经编委会讨论研究，上报会领导审批同意，将本刊物在我会内、外网上刊登，离退休同志可上网观看。

※ 9 月 1 日，离退办筹办的老年大学已经如期开课，欢迎有兴趣爱好的离退休同志积极参加各项活动。

一九四七年在西柏坡参加 土地改革运动的回忆

梁 畊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爱国学生运动。1946年在北京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夏，国民党反动派盯上了我，限制我的活动。在此危急情况下，党组织断然决定派我到西柏坡革命根据地去接受新的锻炼。

经过一个月艰难曲折的历程，我到达了西柏坡，见到了中央青委的荣高棠和北京市委的刘仁等同志。我循例把姓名改为梁畊。

在西柏坡，我参加了土改训练班。之后，担任东回舍镇五荣乡土改工作组组长。在工作过程中，与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政治方面，在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环境里，大大增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和人生观。

在组织方面，经过锻炼加强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组织性、纪律性。总之一句话，就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在生活方面要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例如供给部发给我的灰色棉军裤太肥大，穿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我就向女同志要了一点针线，自己把裤子改成西式的，把白色的裤腰改成了一个枕头。当时是秋、冬季节，每天起床后，把满身的虱子投入火盆里烧掉，接着就打一盆冷水冲个澡。然后用干布把全身擦一遍，使全身的血流和精神达到非常好的状态。在离开西柏坡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

在西柏坡，我们一日两餐。主要是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外加三、四两玉米窝窝头。这不是由机关供给的，是由农会发动中农提供的，偶尔也吃糠窝窝。

1947年12月，我学习了《晋绥日报》刊载的毛主席著作《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毛主席在文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新中国即将诞生。而旧中国和蒋介石集团即将灭亡。我学习后，感到无比振奋。

那时，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刘少奇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思想境界大为提高。

1948年5月，受中央青委第一书记冯文彬指派，我从西柏坡出发，经哈尔滨去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国际学联，担任驻会代表，并兼第二任副主席。从此，我投身于世界青年学生运动的国际大舞台，并且踏上了我国民间外交的光辉道路。应该说，在西柏坡大约一年的经历，通过学习和参加土改的锻炼，我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因而至今难忘。





也谈足球

刘庚寅

我不懂足球，但爱看强队之间的比赛。我欣赏那精确无误的传球和射门，佩服球员们奋不顾身的拼搏精神。

最近看了几场世界杯赛。最出人意料的是那场巴西与德国的半决赛。被很多人看好的巴西队，竟然以1比7的大比分输掉。巴西全国哗然。媒体报道，六万多巴西球迷落泪。有一位15岁的女孩竟因此自杀。巴西队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惨败！很多巴西人说，这是巴西的“国耻”。

巴西足球称霸世界多年，为什么这次在家门口输得如此惨？有人认为巴西头号球星内马尔因伤未能参赛是主因。也有人认为主教练用人不当所致。

德国队为什么赢得这么痛快？据报载，7月9日李克强总理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时，也谈到这个话题。默克尔认为，德国队最大的优点是“整体配合，每个球员必须为整体服务。”李克强很有同感。据此，他要求各个部门通力合作，协调推进整体工作。

从巴西队的惨败，说明一个道理：要想赢球，光靠一两个球星是不行的。足球是项集体运动，必须要整体配合。

用人、做事也是这个道理。人才是需要的，但好花也要绿叶扶，也要强调整体配合。选拔人才是很有学问的事。古时就有伯乐相马之说，也有知人善任成就大业者。

有了人才，还要组织一个能互相协作，整体配合的团队。这样才能达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目的。三国时期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美谈，但诸葛亮有再大的本事，如果没有刘、关、张的协作，也难成大事。

世界杯决赛，由德国队与金球奖得主梅西率领的阿根廷队争夺冠军。有人比喻这是一辆战车与一把尖刀的较量。结果德国队1比0获胜。这是集体力量的胜利，是协作精神的胜利！



王炳南与路易·艾黎的晚年

——纪念全国友协成立60周年

吕宛如

1975年夏，“文化大革命”余波未泯，同“四人帮”的斗争逐日升级，人们在忧心忡忡中期待着一场扭转乾坤的暴风雨来临。就在此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迎来了它的第四任会长、享誉中外的老革命外交家王炳南同志。友协上下无不满怀欣喜地期待他

来领导这个身负中国民间外交重任的组织，来一次“大乱后的大治”。果然，他不负众望地成为“文革”后塑造友协在恢复旧交，结交新友，开拓民间友好交流新领域和让世界

重新认识中国等各方面新形象的领路人。他作为在任最长、贡献最丰，深受友协人敬重和爱戴的老领导，确实为友协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友协人永志不忘。

1975年8月王会长就职后的第一次讲话给友协所有职工带来巨大鼓舞，他不计“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和原在外交部的高位，欣然就任友协会长，自称要以“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担起恢复和发展被“文革”动

乱割断近10年之久的中国民间外交工作。他真诚坦率的就职讲话，表现出一个真正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的气度，给所有友协人带来无限温暖和希望。

王会长上任后，刚好赶上新中国建国以来充满大悲大喜的1976年：痛失周恩来总理、



1977年12月2日，全国友协为路易·艾黎同志80寿辰举行祝寿宴会。

图为邓小平同志在宴会 | 向艾黎同志祝酒。

唐山大地震、朱老总和毛主席的相继逝世，以及胜利粉碎“四人帮”等，一系列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友协人在这个关口表现出的爱国忧患意识和处变不惊的政治成熟性，同王炳南会长高瞻远瞩和稳健细致的领导才能和艺术是分不开的。此后，他在布局友协工作上展开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大手笔动作，调动起各部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很快恢复了停止多年的友好交往工作，建立起友好往来的新渠道。友协的工作气氛顿时面貌一新。

旧友喜重逢

我第一次接触王会长是在1977年下半年筹划庆祝路易·艾黎80岁生日期间。王炳

南同志初遇艾黎是在 1938 年，当时艾黎为组织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一事去武汉活动，在中共“八路军办事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听取共产党方面的意见，商谈如何才能争取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其后，王炳南被指定负责帮助艾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那时印度国大党援华医疗队正准备去延安，艾黎得便与他们同行，并向毛主席报告“工合”计划，都得力于王炳南的安排。解放后王炳南同艾黎虽少来往，但互信的情谊仍在。来友协后，王会长听说艾黎在“文革”中曾被“四人帮”内定为“外奸”，其养子和学生不少因同他解放前有关联而成了“革命对象”，内心十分不安。当他知道 1977 年将是艾黎来华 50 周年，同年 12 月 2 日又是他的 80 大寿时，决定由友协出面，为艾黎举办一次隆重的贺寿活动，以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半个世纪在华贡献的尊重和感激。在这次宴会上，代表中国政府讲话的是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这次不寻常的宴会不但邀请了有关各界领导人、新西兰驻华大使及艾黎的外国老友，还请了“文革”中受到牵连的中国养子，抗战年代的“工合”旧友和老山丹培黎学校毕业生。小平同志宴会上中肯、热情的讲话道出了全场人士的心声：“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 50 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之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艾黎在华贡

献第一次给予的最郑重、最全面的评价，不但打消了不明真相的人们多年来对艾黎的怀疑与歧视，也解除了同艾黎有关连的亲亲友友的心理负担，让人们拨开迷雾，开始看到一个真实的艾黎。从此，艾黎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好同志，好战友”成了中国人民对他的一致认知。

艾黎自 1951 年来北京处理停办“工合运动”和山丹培黎学校有关事项后，想在京完成他写作描述新旧中国对比的《有办法》一书。当时恰逢北京正在筹备将于 1952 年 10 月召开的“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委会支持了他的这一计划。当时朝鲜战争还未结束，大多数国家还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欧美代表是冒着政治风险来华的。能在北京召开一个有 30 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大规模和平会议，在国际上确实影响巨大。在当时宣传中国的外文资料奇缺的情况下，《有办法》几乎成了各国代表了解中国的启蒙课本。艾黎作为新西兰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了会议，会后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和平联络委员会”新西兰驻京代表，从此常住北京，并于 1958 年迁进了台基厂大街一号的“和大”大院，最终成了大院的“永久住民”。

艾黎刚搬进来时住在靠大门北楼美国知名作家斯特朗套房的楼上。对面的南楼住着当时被誉为日本的“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家。由于他解放前经历复杂，解放后真正了解他的人并不多。到 1968 年“文革”高潮时，“和大”的造反派竟在他的门口扯起“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大横幅。此事惊动了宋

庆龄，她立即上书中央，为艾黎作证，列举一系列事实说明艾黎在建国前和建国后一直“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并直言“我极端相信他”。这封信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艾黎生平公开化

艾黎的故事早在“工合”运动兴起的抗战年代就在国外传为佳话，1941年埃德加·斯诺曾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过题为《路易·艾黎，建设中华的猛士》一文，引起英、美、新等国人民极大兴趣，把艾黎看成“传奇英雄”。中国虽也有人写过有关他的一些故事，但少见全面、准确的生平记述。艾黎80寿庆的大活动引起中央和各方重视后，王炳南会长感到友协有责任把艾黎这位中国现代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的生平事迹如实推介给国人。在王会长的指导下，美大部对艾黎的接待工作从被动满足其日常要求转向主动征求其意见，并在其帮助下与国外的老朋友恢复联系。同时给他配了专职秘书，更认真地处理他的写作翻译、出版等事。美大部领导和王会长本人常抽空找他聊天，了解他的需求，前来拜访他的老友和采访他的中外人士也与日俱增。

1982年又迎来艾黎的两个值得纪念的大事：一是1927年4月21日他抵达上海开始在华生活的55周年；二是他的12月2日的85岁生日。王会长抓住这个时机，要求美大部交出一篇全面介绍艾黎的传记性文章，由《人民日报》于4月21日当天发表，我被

责成执笔。我那时对艾黎了解有限，在王会长的指点和美大部同事们的支持下，如期完成了任务，写出6000字的长文《老战士的光辉历程》。没想到，此文很快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其中既有过去同艾黎有过交往的老同事、老学生，也有除了知道加拿大的白求恩外，从来没听说还有为中国人民的事业贡献一生的新西兰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

秋后的一天，王会长对我说他正在考虑以他的名义写一篇文章，在12月2日艾黎85岁生日时发表，要我帮他找些有关材料。他说艾黎是个非常有思想、有远见的人，他对中国的了解比许多中国人还要深，还要广，你们应该好好研究他，学习他。过了些日子，王会长把他初步设想的文章内容告诉我，表示这次要着重说说艾黎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他说，艾黎不仅在外国人眼里是“中国的小百科全书”，而且对中国的一些重大政策提过很多宝贵建议和批评意见。艾黎关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建议是有实质内容的，很值得我们参考。他要我到秘书处找艾黎近年的致友协函，其中涉及大规模伐木毁林会造成生态灾难；修建水坝不解决淤泥堆积问题后患无穷；防止农民伐木为薪必须在农村发展沼气、太阳能新能源等诸多问题。艾黎还强调，改革开放后必须注意青年的教育，不能让资本主义思想侵蚀，忘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只向往过舒适的生活……这些意见都是1977—1984年之间他去东北、广西、海南等地访问后提出的，但当时并没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王会长认为，艾黎提这些意见都是

有预见性的，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认真研究。因此他要写的文章不仅是说他解放前的事绩，更要写解放后他对新中国建设的积极建议，让大家更深刻地认识艾黎对中国的热爱和关心。文章就此定名为《革命的好战士，建设的好参谋》。王会长为写这篇文章，从选主题，找参考资料，定内容大纲，到一字字修改草稿，这种高瞻远瞩的视角，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给我后来研究艾黎上了启蒙的一课。

“新西兰的艾黎”和“中国的艾黎”

艾黎在华的传奇故事在新西兰人中早有传闻并引以为傲。随着艾黎日近晚年，新西兰的一些朋友和专家们都主张尽早拍出一部艾黎在华经历的纪录片。1979年新西兰作家杰夫·查波和一些电影工作者来华，邀请艾黎陪他们游走当年他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结果拍出了《一叶两芽》的艾黎生平纪录片，查波事后还出版了《中国的路易·艾黎》一书，纪录了同艾黎重访旧地的感受和当年的故事，在新西兰颇受赞扬。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甘肃的电影制片厂和电视台，也纷纷要求友协协助他们拍摄艾黎生活的纪录片、艾黎与老培黎学校的话剧、故事片等等，艾黎一时成了新、中两方面争相采访和拍片的对象。而且通过他挖掘出许多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和新中国建设的老朋友的动人故事，如抗战时在晋察冀边区建卫生院救助村民和八路军伤病员的新西兰护士凯瑟琳·霍尔等。艾黎以其特殊的身份和贡献，成为沟通中新两国人民友谊的牢固桥梁。无怪在中国人称

他“新西兰的路易·艾黎”时，他又被新西兰人称作“中国的路易·艾黎”。

从1982年起，王炳南会长日益关注如何促使艾黎自己写下他的自传，为后人留下一本可靠的艾黎传记，但艾黎总是推说他有更重要的有关中国题目要写，他自己“那点事儿没什么意思”。最后，他同意口述回忆，由别人代编写，作为自传出版。美大部这回又把任务交给了我，并要求在他健康尚佳时抓紧完成。

我虽然自1952年在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时就知道艾黎，他搬进“和大”院内后也常在各种外事场合见过他，但对他的往事并不熟悉。1982年甘肃省应老培黎校友请求，同意在兰州举行一次“山丹培黎学校创办40周年纪念大会”，让校友们有机会见见艾黎，并去山丹看看。艾黎建议友协邀请当年帮助培黎学校建起校医院的新西兰外科大夫司宾赛来华参加，由我陪同，这才使我第一次有机会和艾黎同去外地，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在老校友和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山丹培黎学校的创业史是山丹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传奇，也是中外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共创的一个精神与物质的瑰宝。

艾黎和司宾赛大夫亲临这次大会和重返山丹在当地群众中掀起的轰动效应，显然激发了甘肃省政府重建培校的意愿。王炳南会长以友协的名义，配合推动有关各方积极支持响应，终获批准。计划还争取到来自新西兰和美国的部分资助。新中友协的积极人士

汤姆·牛纳姆受艾黎之托，曾同倪才旺校长住守在山丹建筑工地，参与新校舍的设计和工程监督。新建的山丹培黎学校在1987年4月21日宣告正式开学。艾黎30多年的复校梦想终于实现了。可惜那时他因身体状况不佳，没能亲自参加开幕式。

此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艾黎念念不忘的恢复“工合”也早已提上了日程。在胡愈之等老“工合”领导人的提议下，经中央统战部批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于1983年11月20日重新成立。艾黎原想继续努力，争取在美、英、新、澳等国的老“工合”朋友支持下，按照过



1982年6月5日，路易·艾黎参加甘肃兰州石油技工学校建校40周年的庆祝活动。

去的模式，重组“工合国际委员会”为“工合”开发新的资金来源，并与国际合作社组织建立联系。但就在1987年9月3日“工合国际委员会”宣告成立后不久，他的心脏病突发，于12月27日与世长辞。

艾黎研究室成立

从1982到1985年，我为完成《艾黎自传》的任务，先后陪艾黎三次去北戴河和三亚休假，利用他的休闲时间以问答或闲谈方式，把他口述的内容录音，回京后由熟悉他的几位秘书打成文稿，参照他提供的文字材料补充修改，编成草稿，由艾黎本人审定。根据各方要求，后来又决定《自传》同时出

英文和中文版，这就更增加了工作量。美大部不少同志都曾参与翻译，王劲伯老师也被请来帮忙校改等工作，大家全力以赴，赶在1986年12月2日庆祝艾黎86岁生日那天，由友协和《中国建设》杂志出版社正式宣布发行。我们干成了，而且是以艾黎欣赏的“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干成的。

艾黎的晚年应该说是过得丰富圆满的。他之所以能不留遗憾地实现他恢复“工合”

和培黎学校的好梦，而且把他多彩的一生经历和珍贵的人生感悟以《自传》形式留传于世，都与他同旧友王炳南有幸重逢有关。王会长的国际视野、政治智慧和历史

责任感，让艾黎的好梦得以在最后数年内一一成真，也使得人们更加珍惜他一生对中国人民所作的贡献以及留给中国人民的精神和物质遗产。

1986年1月王会长结束在友协的任期，离职前作出的最后一个决定是批准在友协成立一个统管艾黎事务的“艾黎研究室”，负责统筹规划进行有关艾黎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举办有关的纪念性活动等。我成为研究室的负责人。

1990年正式退休后，我成为恢复“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一名志愿工作者，直至新世纪的2006年。

怀念韩叙会长

苗在芳

1989年初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来了一位新会长，他就是刚从驻美国使馆离任的韩叙大使。自此到1994年7月19日，整整五个春秋，他在民间外交这块新土上孜孜耕耘，直到最后一息。我是韩叙会长手下一兵，在追随他完成一些任务的过程中，不仅有幸领略到他作为资深外交家特有的原则、严谨和渊博，更在细微末节处体察到他平易、勤奋和俭朴的个人作风和品格。一些事情令我终生难忘。

韩叙会长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的例子举不胜举。1993年我曾两次随他出访，一次是去南非、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另一次是去以色列和土耳其。两次都不轻松，因为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以色列对外关系委员会均要求他作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及中美关系等专题讲演。韩会长欣然接受，视之为宣传我们自己的极好机会。他告诉我，驻美期间，他在美各大城市讲演300多次，平均不到两周一次。他对这两个讲稿的起草、审定乃至校对、排版每一过程的关注，不亚于一个母亲对腹中婴儿的关切。他不仅贡献出自己积累的中、英文资料，连个别英文用词、版面字号都一一斟酌。在国外，马

不停蹄的紧张劳累之后，他还反复朗读讲稿，连语调、速度都要征询我们的意见。讲演的时候，他镇定自若，机警而准确地回答每一个问题。两国与会的外交界、新闻界、知识界、工商界等人士对中国团长的风采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以色列，除去一场接一场的会见、交友活动，最后只剩一天时间参观访问，主人

盛情地利用每一分钟让我们多看多听，夜幕笼罩后才迟迟进一家饭店请我们吃晚饭。韩会长连这一机会都不放过，建议边



图为原全国友协会长韩叙同志

用膳边总结两国民间友好

工作。针对以中友协成员年龄偏高，他提出如何将两国人民的友好传到青年一代的严肃问题。主人十分感动，说在他们协会后面有一只有力的手在支持他们。韩会长去世后，该协会会长还撰稿评价他对人民友好事业的深谋远虑。

结束对非洲三国的访问后，经停法兰克福回国，韩会长利用4小时的转乘时间，在机场VIP的休息室里召集大家开了总结会，提前做了回国后该做的事。连续两个多星期的差旅生活，青年人都感疲惫，我劝韩

会长抵京后修整一、两天再上班，他答应了。第二天，我在家里接到他一个电话，才知他已坐在办公室里。再一问，当晚还得出席一个招待会。招待会后还得作名片记录，这是他多年从事礼宾工作养成的习惯，天天如此，即使在出访的日子，一天的活动结束得再晚也从不间断。他说，名片档案记的越细，对一个人的印象就越深。他如此劳心，难怪有非凡的记忆。很多驻华大使视他为“活字典”，时不时向他查人头，他能按年代顺序讲出一个人的职务晋升史。还有人问他建国初期一些国家驻华使馆的旧址，他不用地图即可准确无误地列出一系列的街名和门牌号。在他去世后，传达室一位同志说，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韩会长都要来会里上一阵班。

我们经常议论：韩会长如此满负荷地工作究竟累不累？其实，哪有不累的呢，他是靠一种精神，一种意志，一个追求的支撑。记得他永远离开办公室的那一天，午前我去他那里，为下午某国大使拜会向他报告情况。他刚开完党组会，脸发红，显然有烧，用胳膊肘撑着桌边勉强站着，说话有气无力。我第一次见他如此疲惫，即建议他快去医院，他还想坚持完成下午的会见。一进医院就被医生扣下，住进了病房。5月初，他拖着病体，坚持着主持了友协第四届全国理事会的主要活动。七月，他的病急剧恶化的那几天，听说他还在惦着他要在大洋彼岸继续完成的事。他是带着对工作的热恋离我们而去的。

和韩会长出差，又有十分轻松之感。他

个人生活之简单、之俭朴，他是那么一丝不苟地奉行“自己动手”，让人觉得时间在他身上凝固了，他仍是四十年代延安的一个兵。已近七十高龄的他，烟酒不沾，有一杯白开水就解决了渴的需求，“奢侈”一点，也就是一杯热牛奶。参观访问之后，回到住处，我们总爱匆匆洗涮，在床上懒懒地躺一下。韩会长却抓紧分分秒秒，洗自己的内衣、衬衫。我几次劝他：“您是代表团团长，衬衣就交给饭店服务员吧”，他总是笑笑，说边洗衣服边听音乐是他喜欢的休息方式。后来，他夫人葛绮云大姐也证实：几十年前他作为青年军人养成的自己洗衣的生活习惯一直伴他终身，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几天才让夫人、女儿尽一点爱心。有一天，我坐在他正背后的车座上，发现他的青绿细条纹衬衫领口已起纤维毛，便说：“韩会长，您该换一件衬衫了。”他仍笑笑说“要不是我轻搓轻揉，它早该报销了。再维持一段吧”。他顺便告我，身上穿着的一套西服也是十几年前的。到了纳米比亚，天凉了，他换上一套厚毛条呢西服，他说那是他在美国旧金山的姐姐送的礼物，亦有好多年了。然而，无论何时，他总是衣著整洁、以干练、挺拔的堂堂仪表出现在各种场合，谁料到这是他自己忙里偷闲洗烫擦拭的呢？一个偶然的机，我还获知他会针线活。那天，我们从伦敦连夜飞约翰内斯堡。第二天清晨抵达时，他告诉我，夜里发生一件有惊无险的事：在头等舱里坐定后，他抽空缝修脱线的手提包，不小心戳破了指头，后半夜指头红肿、疼痛难眠，他很担心意外事故发生影响公

务。幸喜天亮后肿消痛止。我这才注意到他那很旧的黄皮手提包上多处有新旧不同的针线迹，心中很过意不去，对韩会长说，这些针线活原本可以让女同志干的。他半真半假地说：“我怕你们干不好。这个皮包是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时买的，一直跟着我，很有用，放书本、眼镜、牙具、药品、小五金、针线包等，随时缝修，已很有水平了。”

韩会长的吃、穿、用如此不讲究，生活却充满情趣。他通晓音乐和书法，外国大使们常常听他讲得入神；他喜爱体育，60多岁了，每天清晨要做几十次俯卧撑；他喜欢照相，留下生活的足迹；他还喜欢大自然，像孩童似的捡拾海边的贝壳、石子；他还充满幽默，一次，我们路过南非一个小城镇的小教堂，那里正举行婚礼，我们驻足观看，韩会长评论新郎的秃顶说，“噢，也是中央空虚，靠地方保中央了！”逗得我们捧腹。

“是大使而不像大使”，听说一位美国朋友这样概括他对韩会长的印象。韩会长的

确是官而不像官。他没有官的威严，从不讲官的排场，有的只是普通老百姓的平易和乐于操持。他身兼数职，要考虑的事很多，却从不因此居高临下，而是处处身体力行，以榜样感染部下。会见前，他会亲自检查室内空气是否新鲜、桌椅是否洁净、地毯上是否有存留物，要是有的话，他会弯腰捡起来。宴席上，他一边专心与客人谈话，一边还帮助服务员弥补疏忽，什么时候该换盘子、什么时候该添加饮料，他都很注意。外国人向他反应的要求，他挂在心上，以“外事无小事”认真落实。中国同志的事，他从不敷衍，合理的、符合原则的要求，哪怕是来自一个小小老百姓，他都说到做到、一帮到底。对拉关系、走后门的，他一概不讲情面，一律拒之门外。友协许多同志，特别是年轻人，谈起韩会长与他们的如师、如长、如父、如兄的促膝谈心，无不勾起对他的深深的怀念。

韩叙会长，您生前太操劳了，九泉之下您得多休息、好好休息。

太平洋不太平

孟宪如

太平洋上不太平，乌云滚滚电雷鸣。
豺狼虎犬嗷嗷叫，似要反华唱和声。
鬼子喜做霸主梦，幻想东亚圈共荣。
亚太今日非昔比，岂容军国再逞凶。

忆郭东俊

顾子欣

1972年5月，对外友协与和大、亚团合并，迁入原和大的院子办公。内设机构由组改为处，共设10个处。我原先在亚洲组，此时便成为亚洲处成员了。每处除处领导之外，各有一名常务理事主管其工作，好比会与处之间的桥梁，起承上启下作用。主管亚洲处的常务理事是郭东俊；他另有友协副秘书长长的头衔，故比其他常务理事们似乎还高半格。

郭东俊是军人出身，上校军衔，是随老友协过来的；而我是老和大的，故原不相识。在我当时的眼光里，他是属于高干范畴的干部了。但他却平易近人，毫无领导架子，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在许多年里，他都是骑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上下班，天一冷就披上一件军大衣。他和大家一样，中午在友协食堂吃饭，在饭桌上与人说笑聊天。大家都习惯叫他老郭。无论是干部、翻译、司机、工人，都喜欢跟他开玩笑，都能跟他说到一起。

那时接待外宾，强调给外宾做工作，但往往做法生硬，用一些套话向外宾灌输。而“文革”之中此风尤烈。然而郭东俊不是这样，不是向外宾照本宣科的讲大道理；而是用他自己的语言，以朋友间谈话的方式，向外宾做宣传，因而外宾愿意听，常取得较好的效果。我给他做过无数次翻译，很欣赏他

的谈话技巧。他也很会交朋友，每当他陪同接待一个代表团，过不了两三天，他就与全团的人都搞得很熟了。这当然也与他懂英语有关，他曾在部队里学过英语，能用英语与外宾简短交谈。他讲英语还善于现学现卖。有一次陪外宾去参观工厂，将到工厂时他告诉外宾：“We are approaching the factory now.”（我们快到工厂了。）我称赞他用了“approach”（接近）这个词，他笑着说：“我听你这样说过；我这是照猫画虎呢。”

在工作上，郭东俊对我很放手，也可以说对我较赏识。我在亚洲处原只是一名翻译，没有任何职务，但有一天老郭对我说，他已与老孟（孟宪如，时任亚洲处处长）商量过，也与会领导打了招呼，今后亚洲处的英文翻译工作由你负责，对外的英文信电由你定稿。随后他在亚洲处的会议上宣布了这件事。虽然做翻译定稿并非一官半职，但让我觉得在肩上担了一份责任。以后又宣布我为南亚片片长，尽管这也是个虚职，但名义上算带了个“长”字。我知道，老郭在我的擢拔任用上是费过心思的。

在政治观点上，老郭与我也是彼此相通的。“文革”后期，形势波谲云诡，人心愈感压抑。“批林批孔”还没有完，又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反正外事工作不多，

大家成天的学习讨论，手里各捧着个茶杯，东拉西扯虚掷光阴。一个处不过十几人，但尔言我语，各有一心，从发言中透露出不同的立场。老郭对这些“运动”持消极抵制态度，在会上发言时旁敲侧击，说过一些带刺的话。有个年轻人就向党委反映了他的言论；党委为此找他谈过话。而我却因此从心里更加佩服他。

1976年3、4月间，巴基斯坦文官学院代表团访华，由老郭全程陪同，我是翻译。4月4日，国家领导人在人大大会堂会见代表团，车过天安门广场时，见广场被淹没在悼念周总理的花圈里；而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已是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5日我们陪外宾去南方访问。7日晚我在扬州宾馆里听到新闻广播，说天安门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听后悲愤难抑，跑到老郭的房间里，向他宣泄我心中的愤懑。老郭说：“新闻我也听到了；这国家要大乱。”但他提醒我要克制；又说：“现在还没有对外表态口径，别跟外宾谈这事；也别跟其他人随便议论。”第二天在宾馆餐厅用早餐，中联部的几名陪同与我们同桌，提起“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老郭却忍不住了，说“怎么悼念周总理也成了反革命了！”同桌的人一声不吭。送走外宾后回到北京，老郭即又被党委找去谈话，原来中联部的人告了他的状了。

老郭受到里外夹攻，成了内部备案的人物，不得不谨言慎行，不再在会上放炮了。但他私下里还与我议论时局，或交换一些小

道消息。他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有时就把我叫进去，借谈工作说些不能在公开场合说的话。10月的一天，他兴冲冲地走进我们的集体大办公室，在门口叫我说：“小顾，你到我这儿来一下。”我跟他走进他的办公室后，他随即掩上门，兴奋地轻声告诉我：“抓起来了！”我问：“把谁抓起来了？”他说：“把‘四人帮’抓起来了！一个没跑，都抓起来了！”我说：“真的吗？”他说：“千真万确，部队高层已经传达。不过现在还是保密的，你不要对别人说。”所以在亚洲处我可能是第一个知道“四人帮”被捕的人。但我没有遵守老郭的叮咛，很快就把这消息转告了我觉得可信的人。

打倒“四人帮”后，我与老郭又一起接待过外宾或出国访问。1978年，王炳南会长率友协代表团访问印度，老郭是该团秘书长，我是翻译。代表团抵达新德里机场时，欢迎者纷纷与王炳南握手。王带着一个皮公文包，显得有一点碍事。从机场去市内，印方安排团长与翻译乘小车，代表团其他成员乘大车。老郭便对王会长说：“把这公文包交给我吧。”王点了点头。代表团到了下榻的饭店后，王索要公文包，但郭却找不到它了。全团人员皆为此紧张，因为在国外遗失公文包是严重违反外事纪律的事。最后不得不通知印方，总算在那辆大车上找到了公文包；原来是老郭把它忘在车上了。老郭向王自责说：“我检讨，我写检查。”王说：“你写检查有什么用；这包真要是丢了，是该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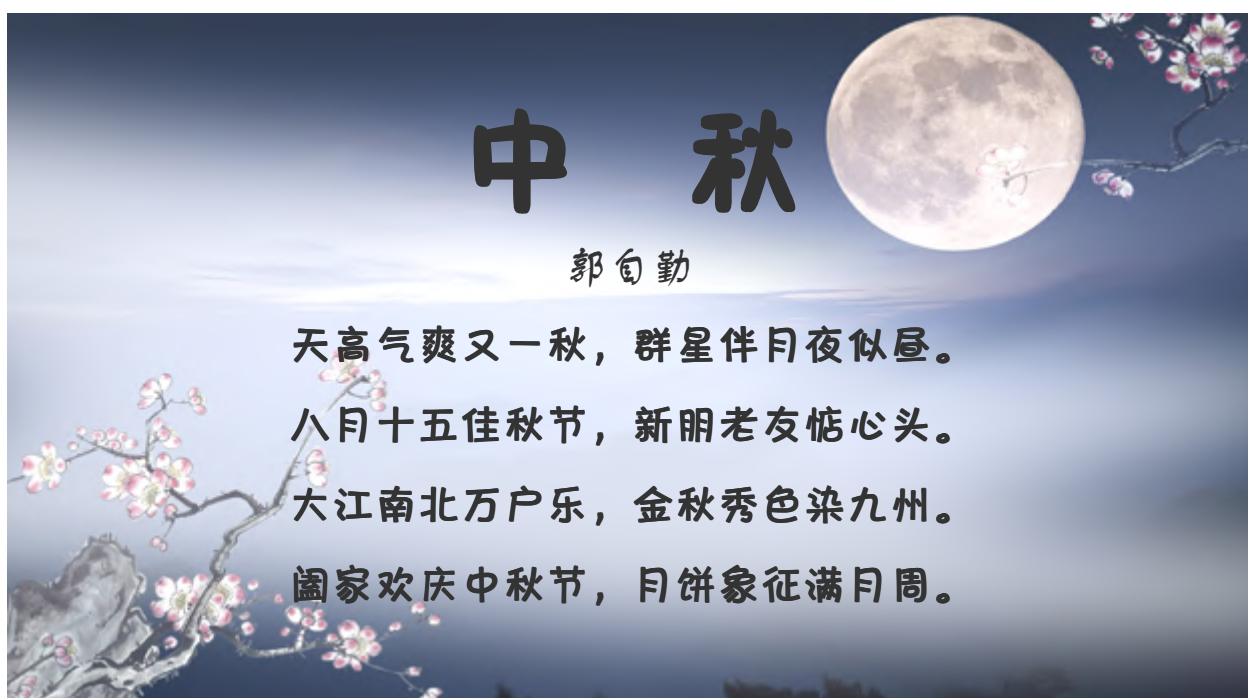
向外交部做检查了。”但我对老郭很同情，因他满腔热情本意是为团长减轻负担啊。

1979年，友协代表团访问泰国和菲律宾，我又与老郭同行。回国途经香港休息时，我和一位在那里的所谓的亲戚见了面。这是个拐弯抹角的亲戚，之前从来不通音讯，但此时大陆开放政策放宽了，才彼此取得联系，见面后待我格外热情。我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机，小儿子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就搬个板凳到有电视机的人家去看。所以我想这次路过香港时买一台电视机。这位亲戚知道了说要送我一台，而且是彩色的。我坚决不接受；后同意她给买，但我将按原价用人民币把钱还给她在北京的弟弟。我把这一情况向老郭（代表团秘书长）做了汇报，经他同意后，买了一台14吋的彩电。但不料此事竟在友协惹起了风波。有人甚至说这是套汇行为，应于追查处理。老郭在这时出面为我说话了。他说：“小顾每月工资不过60多元，

买个电视机不容易；现在借了钱在香港买台电视机，这又有什么错？再说他是向我汇报过的，如要追究责任，就先追究我吧。”当我听到老郭的这段话时，我的眼睛都湿润了。

后来老郭离开友协回部队去了，退休时享受将军待遇，搬了一所大房子。我曾经去他的新居看过他，他带我把各个房间看了一遍，说：“以后我就在这儿闲居养老了。”之后我们还有电话联系，但近年来失去了音信。他倘若还健在，应是90多岁高龄了。

我在友协工作数十年，有许多事和人深藏在记忆中。郭东俊是我所怀念的我的老领导之一。他正直，开朗，遇事敢于担当；他与人为善，他从来不整人，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是一种何其宝贵的品格。我每当想起他，眼前就浮现出他亲切的笑容，他的高高的披着军大衣的身影。



请继续父辈们的梦想

周小平

我们这代人从出生到成长所面对的，是一个在舆论和语境上完全被西方垄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西方舆论以及当前的一些公知们正在用片面的信息围墙遮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无法眺望远方。在这堵信息围墙下，被扼杀的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被扭曲的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和进取心。而最终这一切很可能会彻底击碎我们这一代人的信仰，并极有可能因此葬送掉我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们本来唾手可及的美好未来。

在面对强大对手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臣服，只有极少数人会坚持抗争。但生存没有给我们退缩的理由，除了抗争，我们再无出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打破思想禁锢，我们父辈的终极梦想就不能实现，他们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付出与牺牲就会白费。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我们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史。西方列强凭借其一时的科技领先为地球上的其他文明打造了三重枷锁。第一重是屠杀，第二重是殖民，第三重是洗脑。西方列强对异己文明一律实行屠杀政策，只有当杀不干净的时候才会使用殖民政策，而要对付那些连殖民这招也无法征服的文明时，他们则会戴上温柔的面具对其进行舆论和思想洗脑，直至其在精神上自取灭亡。

从17世纪开始，西方列强依仗船坚炮利开始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屠杀和掠夺。由于军事实力差距，地球上一些文明在这场浩劫中彻底毁灭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断消失，正在被单一的西方文明取而代之。

在西方列强带来的这场全球文明浩劫中，中国称得上是一个例外。中国熬过重重难关，最终走向独立自强。我们的父辈先后粉碎了西方列强企图给我们戴上的第一重枷锁和第二重枷锁，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从困境中逆流而上。挑战仍未结束，我们这一代人从出生开始就被迫接受着西方列强的文化冲击和思想洗脑。中国的未来终将会交到我们这代人手里，如果我们不能和大多数人一起冲破这道信息围墙，最终还会走向精神的沦丧。

我们的先辈们在最惨烈的屠杀和战乱中没有输，我们的父辈们在最残酷的饥荒和磨练中也没有输，所以我们今天更不能输，否则这一切都太不值了。我们生在这个关键的时代，别无选择，唯有继续坚持父辈们的梦想，去争取实现最终的胜利。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守护家园的天性和基因，精神家园和地理家园一样重要。

请不要再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因为你的爹妈也是中国人，没有他们火热的信仰和

不计得失的付出就不会有你今天的生活。

请不要再说：“中国人没有道德。”因为你的爱人同志，你的子女也是中国人，如果他们也没有道德，你就不会有家庭的温暖。

请不要再说：“中国人没有素质。”因为你也是中国人，就算你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禽兽，那也只是你自己而已，不要代表我们。

请不要再说：“中国没有未来。”因为你们的孩子还很小，他们还有漫长的一生要度过，如果你们掐死了他们心中的那份希望与光明，那他们将如何走完这一生？

请不要再说：“中国与我不关，大不了我移民。”因为就算你移民了，如果中国出事，你也会跟着遭殃。我们生来就和这个国家紧密相连，我们终其一生无法将自己与国家命运完全割裂。只有中国强我们才能强，只有我们实现了梦想，中国才能复兴。所以，请不要再污蔑我们这个民族，请不要再诋毁我们的同胞，因为你的每一次大范围泼污都是对希望的扼杀，对光明的遮蔽，是无知的轻狂。

我的朋友们，请像我们的先辈那样擦亮眼睛，鼓足勇气，勇敢地站起来挑战西方列强布下的最后一道枷锁吧。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无论我们今天做了什么，请相信历史会给予公正的评价。

▲（作者是作家、时评人，郭自勤摘自《环球时报》）



讣告

我会离休干部里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7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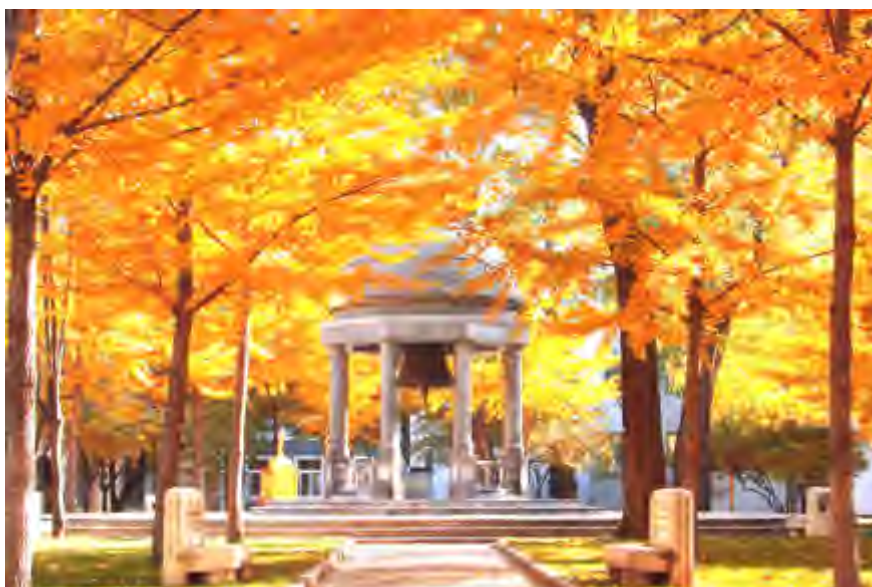
里若同志，原名王铸廷，安徽嘉山人，1927年出生，194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10月参加新四军，1988年12月离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在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解放后历任新华社编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际会议活动办公室西方组负责人，中共吉林省四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亚洲处处长、政治处主任，驻科摩罗大使馆代办，驻索马里大使馆参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文化交流部副主任等职务。

里若同志政治坚定，热爱党的民间外交工作，事业心和责任感强，作风扎实，严于律己，乐于助人，团结同志。我们对里若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友协秋色照片集锦



摄影 杨增琪



摄影 杨增琪



摄影 张淑君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富強 民主 文明 和諧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愛國 敬業 誠信 友善

壬午仲夏金城書於京華

